

## 抗战记忆 桂林抗战文化城名人录③



①

## 从文学少年到新四军战士

杜宣1914年出生于江西九江。其父亲在邮政局工作,和江西省中共早期创始人宋大勋交往甚密。因此,少年时期的杜宣在懵懂中便接触到了革命工作。受到革命前辈们言行的影响,幼时的杜宣就认为革命工作是一件神圣的事。

1926年冬,革命军打来了,杜宣自告奋勇地当上了县儿童团团长。大革命失败后,杜宣去了上海,于1932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附中读书,被选为学生会主席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3年,杜宣组织三三剧社,并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。在那个年代,很多中国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,他们立志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带回祖国。杜宣也成了“留洋大军”中的一员。在日本东京,杜宣在学习之余积极从事文学和戏剧活动,组织杂文社、主编《杂文》月刊。他编辑的期刊里每期都有鲁迅、郭沫若等大师的文章,这让他长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。当民族危难、家园破碎之时,杜宣揣着一颗赤诚之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。回国后,他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。1938年,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已汇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。为了向社会展示和扩大影响,军部决定战地服务团组织一场公演。于是,杜宣与舞蹈家吴晓邦、编剧李增援等人一起加班加点筹备,将舞蹈、剧目等多种形式融到公演中。公演在江西南昌市警察大礼堂举行。当晚,杜宣代表服务团向观众做简单讲话。在幕前的聚光灯下,杜宣介绍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的宣传队,他希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,与社会各阶层合作,将抗战进行到底。他满怀激情地说:“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,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,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!”

后来,杜宣带领文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,大大鼓舞了战士和群众的抗战士气,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。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“大逮捕”。于是,杜宣随组织撤离江西。

## 从省立艺术馆到新中国剧社

1940年春,欧阳予倩在桂林筹建广西省立艺术馆。当时在桂林已经云集了大批文化名人,开辟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战场。欧阳予倩从吴晓邦那里了解到杜宣是戏剧方面的人才,于是特地邀请杜宣来到桂林,共同开展戏剧文化运动。

杜宣到桂林后,先是在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工作,帮助其整理桂剧资料。据杜宣后来回忆,当时桂剧团每晚演四出折子,欧阳予倩每晚在剧场给他留固定座位,看完后要对每出戏提出意见,为桂剧改革做准备。杜宣此前在战地服务团主要以广场宣传为主,已习惯了轰轰烈烈、激情四射的形式。如今让他静下心来在小剧场看戏,一时间难以习惯。一天,他与田汉在闲聊中吐露心声。田汉闻知大笑,并赋诗一首以作调侃——

“读书学剑不成欢,且向榕城作看官。金凤玲珑飞燕好,周郎从此做人难。”

后来,杜宣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救亡日报社,由夏衍领导。之后,由于皖南事变发生,杜宣在省立艺术馆的工作受到影响。杜宣根据党的指示,另行开辟新的工作。正在这段时间前后,国防艺术社副社长李文钊被免职,十分失望,但对戏剧事业又颇感兴趣,于是他想筹组一个独立自

## 杜宣:

## 「半生踪迹浮沧海,

□本报记者

张苑

## 一片忠诚唱赤旗

杜宣的民办职业剧团。李文钊邀约了几位朋友集资,自己还把房子卖了,于1941年初办好了社团登记手续,定名“新中国剧社”。新剧社成立需要广纳贤才。杜宣在戏剧方面的才能让戏剧家李文钊十分欣赏,于是他向杜宣发出邀请,希望共同组建新中国剧社。杜宣认为这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拳脚的大好机会,便向组织请示并得到同意。

为了组建新中国剧社,杜宣奔波于湖南和广东,找到田汉、洪深等戏剧家求教,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。于是,在1941年10月,新中国剧社正式成立,由李文钊任社长,经济上由他负责,艺术上和人事方面由杜宣负责。于是杜宣、许秉铎、石联星、严恭等演剧队的同志全部脱离广西省立艺术馆,加上各地演剧队新来的一些同志共20余人齐集到位于福隆街的社址,开始投入剧社的工作。

后来,田汉为支持剧社的创建,举家从湖南迁来桂林。田汉的到来,对整个剧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。

桂林市区的临江路位于漓江东岸,与伏波山、叠彩山隔江相望。在这条路中段的临江一侧,一面富有艺术设计感的纪念墙静静矗立,上面“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”几个金底蓝字十分醒目。碑文上记载:“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10月5日,是中共领导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。……由李文钊和中共党员杜宣创建。”

杜宣的名字不止于镌刻在这块纪念墙上,翻开桂林抗战文化史料,他的名字还常见于铅字中。80多年前,在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个特殊时期,这位“左手烟斗、右手剧本”的文化斗士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在桂林的近三年时间里,杜宣不仅创办了新中国剧社,还积极参与戏剧创作、期刊编辑等文化活动。他怀着一腔热血,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中,在美丽漓江之畔留下了一串串闪亮印记。



②

1941年10月,剧社首演由杜宣执导、陈白尘创作的《大地回春》。后来,杜宣创作的《英雄的插曲》和组曲《南山之行》相继与观众见面。田汉创作的五幕话剧《秋声赋》也在新中国剧社公演,引起轰动。连演七天,盛况空前。田汉十分兴奋,赋诗一首以示杜宣——“门牙打落血犹鲜,错节盘根见杜宣。终于风雨鸡鸣日,唱出秋声赋一篇。”

1942年后,新中国剧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,相继排演了《饮差大臣》《大雷雨》《风雨归舟》等多部具有影响力的剧目。于1943年初先后赴衡阳、湘潭、长沙等地旅行公演。在旅行期间又排演了曹禺的《蜕变》、洪深的《黄白丹青》、阿英的《海国英雄》及《复活》(夏衍改编)等剧。旅行演出解决了剧社经费上的困难,扩大了剧社的影响。1943年底,剧社回到桂林。第二年,剧社参加了田汉、欧阳予倩等人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,并演出了《戏剧春秋》和《大雷雨》。

在当时被誉为“文化绿洲”的桂林,新中国剧社仿佛火种,点燃了民众心中抗战救国的烈火。

## 视戏剧如生命,戏剧也救了他的命

在桂林期间,杜宣活跃于桂林进步戏剧界,除了创作剧本,他还发表剧评,参与创作座谈等。当时,桂林剧坛很多活动都有他的身影。在郭沫若、阳翰笙等主持召开的“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”上,杜宣的名字与胡风、老舍、茅盾、洪深、石凌鹤、姚蓬子、马彦祥等同时见诸报端。杜宣还与焦菊隐、欧阳予倩、夏衍、孟超等应邀参加洪深的《包得行》与宋之的、老舍的《国家至上》演出座谈以及有田汉、柳亚子、茅盾、于伶、安娥、蔡楚生等参加的“历史剧问题座谈”等。

1940年春天,田汉第二次来桂林,和夏衍在一次聚会上,谈到很有必要出版一个戏剧刊物,用来宣传抗战戏剧,批评一些不利于全民抗战的戏剧倾向。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了当时戏剧界人士的广泛支持,大家积极为出版刊物募捐公演。经过短期的筹备,《戏剧春秋》于1940年11月1日在桂林创刊,杜宣担任主编,社址设在丽泽门外老君洞附近临时租用的民房里,这里既是《戏剧春秋》的编辑部,又是杜宣等人的宿舍。

《戏剧春秋》是当时进步戏剧界的一个重要平台,其内容包括:整理介绍适合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;对剧作展开批评与介绍;发表各种戏剧剧本,特别是短小精悍能教育群众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;报道戏剧工作者的活动;等等。在杜宣的组织编辑下,郭沫若的《高渐离》、田汉的《岳飞》、夏衍的《冬夜》、洪深的《回到祖国》、欧阳予倩的《战地鸳鸯》等剧本在《戏剧春秋》上陆续发表,同时还有舒非、瞿白音、曹葆华、章泯、沙蒙等翻译的外国戏剧理论文章。“杜宣及其同行的努力,为后人梳理中国抗战戏剧发展史积累了很多资料。”著名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说。

在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前,杜宣除了参加《戏剧春秋》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外,自己也先后为《戏剧春秋》写了《关于剧作上唯唯头的倾向》(创刊号)、《一个旧问题的新提出》、《论公式化》、《演员与观众》、《一个马戏班女艺人之死》等一系列关于戏剧的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,杜宣针对当时话剧创作中的某些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提出必须“加强戏剧的严肃性质”,“以提高正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的新话剧”。他号召当时的作家们去参加实际的斗争生活。因为“中华民族从数千年奴隶生活解放的这一伟大时代的史诗,是参加击碎这枷锁的实际斗争过程的作家们所写成的”。

他还明确指出要“克服公式化的作品,必须首先克服公式化的生活”。

“杜宣的这些观点和主张,无疑代表了当时话剧创作中的一些新思想,也紧密联系了当时的一些思想实际,对当时话剧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有一定影响和起了一定作用的。”魏华龄在《杜宣与桂林》一文中这样说。

除了适时写作一些戏剧理论和评论的短文外,杜宣在剧社的繁忙工作之余,还积极从事剧本创作。1942年他创作《自修室的黄昏》(独幕话剧)和《英雄的插曲》(二场话剧),其情节感人,表现了郭沫若的爱国主义及其夫人深明大义的高贵品质,以及两人之间的浓厚感情。“很多观众都流了眼泪,曲终人散去,剧场弥漫着温暖的气氛。”曾经的观众在回忆当时演出的情景时这样说道。

在桂林,杜宣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中,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正是因为戏剧的影响力,让他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。

那是1943年暮春的一个下午,天下着大雨,杜宣在观音岩家里伏案写作。突然,竹篱墙门被猛地推开,闯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。他被淋得浑身湿透,神情紧张而又有些慌乱地问道:“你是杜宣?”反问道:“你有什么事情?”“我是赶来告诉你,特务马上就要来逮捕你了,快跑!”青年急切地说。杜宣心中满是疑惑:

“我在桂林只不过写写文章、编编剧本,宣传抗日救国,为什么要逮捕我呢?”这位青年又急又气地向杜宣一一五一十解释。原来,小伙的一个亲戚在军事委员会担任文书,他找亲戚办事时,发现一张逮捕令,上面有杜宣的名字,于是在心里记下门牌号,马上冒雨跑来通知杜宣。“我说的是真的,你就快跑吧!”青年人说到这里语气变得很恳切。事后经过核实,这个小伙说话没有半点虚假。对此,杜宣十分感慨,是进步戏剧救了他的命。

于是,1943年春,在组织的安排下,杜宣撤离桂林前往重庆。

杜宣的经历是传奇的。离开桂林后,杜宣先后在重庆、昆明、香港、上海等多地工作。他一面以戏剧为枪,为抗日救国鞠躬尽瘁;一面以隐蔽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,为新中国的诞生竭尽全力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。1957年后,他历任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、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、对外友协上海分会副会长等职,还曾长期从事亚非作家协会工作。他的一生都在为戏剧文学事业默默奉献,一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他胸膛里跳动。

晚年的杜宣曾写下这样的诗句——“半生踪迹浮沧海,一片忠诚唱赤旗。纵有繁霜摧两鬓,更磨利剑击苍鹰。”

这是他的内心独白,也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图①: 杜宣像

(资料图片)

图②: 位于临江路的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  
记者张苑 摄